

五四精神永放光芒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概述

卫 鸿

【摘要】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以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畅谈了五四运动的时代意义。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在新时期继承五四前辈舍身忘我的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要确立五四运动化腐朽为神奇的历史定位，深刻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纪念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深入探究五四运动的真实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真理；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充分认识到从五四运动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对五四运动中的批孔现象要做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充分认识到当时批孔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只有恰当处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五四运动对民众地位的质的提升。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时代价值；社会主义

2019年4月24日，北京，春雨淅沥，春树葱茏。老中青三代学者聚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发表讲话。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彭光谦、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周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毓康、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作重点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王广提交书面发言。

与会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畅谈自己研究五四运动的心得。

张全景作为我们党组织战线上的老领导，总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以“弘扬五四精神，夺取新的胜利”为题，首先发表讲话。

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为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了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以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使国民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一次伟大的觉醒。五四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从北京发展到天津、上海、济南、杭州等地，从北京的1000多人发展到24000人，全国发展到几十万人，就是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口号鼓舞下开展起来的。一大批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挺立潮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迅速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成立了新中国，全国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毛主席“人民万岁！”的口号中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恢复国民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又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从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从受人欺凌，任人宰割走向了民主独立。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任意欺凌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百年来的变化，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军事等全面的深刻变化，是改天换地的变化，是前无古人的变化，是全国亿万人民拍手称快的变化，遍地响彻“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走来，新中国从五四走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一切辉煌成就都是从五四走来。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第一，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发动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如照彻黑暗的阳光，为苦闷中摸索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党的先驱李大钊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著作；瞿秋白相继发表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还有很多人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原著，为人民思想的解放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要继承弘扬五四前辈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鲁迅先生讲过一句名言“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建立中央工农红军，到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多达数千万人。毛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中说，3年以来，30年以来，1840年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忘我牺牲奉献，才有今天的一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100年前参与五四运动的人们的夙愿，如今这个目标前所未有地离我们如此之近。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发扬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肩负起光荣的历史责任，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第三，要坚定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永远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的五四运动很快与工人、农民、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全国响应，声势浩大，越来越强，从根本上震撼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基础。由于群众运动的广泛发展，共产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播下了无数的火种，为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党的发展虽历经曲折，但力量越来越强大，势不可当，无数艰难险阻都被一一战胜。

第四，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葆革命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要把党的建设得坚强有力。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听从指挥，步调一致。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正确的，我们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这是党的力量之源，是团结的基础，只有全党一条心，才能勇往直前。

第五，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要真正掌握这个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多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史的学习有所淡化，不少人没有读过基本的经典著作。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欺骗的手段，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学说。有些人披着学术的外衣，歪曲历史，以重新解读历史的名义抹黑党的历史，蛊惑人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要高度警惕。

姚有志从人类文化数千年的大视野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他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枢纽和桥梁”为题发言。

100年前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救国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起点。

中华民族从迄今6000年前后踏入文明门槛之日起，就创造出战天斗地、经世自强的祖源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然而自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极权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近2000年间，不仅道、法、兵、墨等诸家文化遭到冷落、限制乃至封杀或禁锢，对封建社会起稳定器作用的儒家文化，也不断遭到截取、扭曲和缺陷部分的无限放大。其间除隋唐等朝代外，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原创型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当然不能否认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延续的支撑作用与同化力量，但

是自15世纪始，当西方挣脱了被宗教文化主宰千余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中世纪”的枷锁，陆续启动并完成了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业主导的产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病入膏肓的危重期。

当西方乘文化、产业和政治三大革命的劲风，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扑向中国时，被封建文化冰水浸泡已久的中国社会，立马显出不可思议的麻木、迂腐和不堪一击。自18世纪末起，西方政要和学者对中国社会有数不清的贬损、挖苦和讽刺。法国人贬损中国是“东亚睡狮”，德国人形容中国是“体内血液停止循环的冬眠动物”，最早殖民侵略中国的英国人讥讽中国是“东亚病夫”。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尤为难听，竟挖苦中国人是“木讷、痴呆、未脱离蒙昧状态的非人类”。唯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同时，预言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迟早将爆发革命而开创光明的未来。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初的一篇时评中就预言，未来中国将建立有别于欧洲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的国家名称叫“中华共和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分赃、出卖中国而引爆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文化运动，既是此前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变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更是把新文化运动转向面貌为之一新的中国革命的枢纽和桥梁。在五四运动中孕育而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吹响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大变局甚至是千年大变局的前进号角，拉开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大革命的帷幕。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文化救国是破字当头，以破为主，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则是边破边立，以立为要。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著作贴合实践最紧密。毛泽东著作，大都是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所升华出来的指导理论。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是指导实践的经典论著。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最科学。毛泽东一向反对生吞活剥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一贯坚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向反对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结合实际需求的改造制作，继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等，在马列经典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倒是能从散布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零珠散玉中，找到其折射出的原始影像。

毛泽东的精神世界最崇高、最恢宏。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培育而横空出世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在斗争实践中所展现的崇高恢宏的精神世界，如“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信念，“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英雄气概，“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奉献精神，以及其乐无穷的奋斗品格，以德报怨的大善情怀，人民至上的崇高观念等，以及由此衍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是红色文化大厦的支柱和灵魂。

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的红色文化大系，擘画出红色文化向前延续和发展的中轴线，架设起通往未来思想文化建设方向的桥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先进文化建设上做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自信的统一与结合上，创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决批判那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与新时代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污毒文化，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勇于站在巨人肩上创造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文化，才是对五四运动的最有意义的纪念。

董学文独辟蹊径，以“五四：不断重温的启示”为题，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切入，爬梳寻绎，发现历史真实，揭示五四运动的本质，明辨思想理论是非。

在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上，首先需要的是真实地还原历史，其次需要的是辨析它的几种发展的可能性，认清其中哪种发展是真正符合历史潮流的。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主观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五四’时期，反对旧礼教，反对贞操观念，反对家庭中的父权的专制统治，反对旧的传统文学，具体情况很复杂，但基本上是从革命要求出发的。要革命，就要打倒旧的东西的束缚，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不过，其中正确的与不正确的观点、方法都有。”^①这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火烧赵家楼”的勇士杨晦先生1959年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① 《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436页。

譬如，当时的“激进派”，是从变革的需要出发来看待各种不同观点和方法的。但是，他们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新”，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却并不明确。而当时的“改良派”，有的则是变个方法来推崇旧的事物，并非真心反对旧的封建糟粕。再如反对旧体诗，因为“五四”前一段时期，作旧诗往往跟官僚政客及一些无聊文人的腐烂生活分不开，这些人以吹捧坤角的肉麻诗点缀没落文坛，因之，反对旧体诗也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可是，中国古体诗词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有中国文化极可宝贵的东西，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可惜，在其后的诗歌发展中，这个传统没有合理地继承下来。

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有些话是值得重温的。他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①这个运动胜利了没有呢？没有。虽然“它是革命的”“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但是也失败了”。他号召青年要总结并懂得“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呢？用毛泽东的话说，“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②没有得到落实。加之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其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③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大为改观，各个文化领域都急速发展，所向披靡，走向一条上坡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④或者简言之，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中国的新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反传统”，是一般的“民主”和“科学”呼唤，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是继承和推动这“五四”之后的主流的文化方向，还是维护、眷恋和招魂“五四”当时或之后已经失去灵魂、变成躯壳的文化成分，显然，应当成为不言自明、无须争辩的问题。因为后者已成文化潮流中一股黑暗的逆流，是没有前途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看看瞿秋白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的意见。他评论道，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历史的实况。众所周知，“五四”前后，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都或先或后地在中国流行过、尝试过，但都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并引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逐步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我们需要有这种大的历史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7页。

彭光谦单刀直入，以“弘扬五四精神，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为题，对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主问题结合现实进行了阐述。

五四运动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并非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人民民主的一部分。

就在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的时候，有人乘机肆意歪曲与阉割革命的、进步的、朝气蓬勃的五四精神，极力鼓噪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民主人权”，试图按照他们主子的旨意解释五四、歪曲五四，把五四精神引向他们预设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阶级远未消亡的今天，民主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在历史上，有雅典式的古典民主，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有当代真正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神权和皇权而言，资产阶级民主在反封建、反帝制的特定历史阶段，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虚伪性、反动性就暴露无遗了。在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民主、人权从来就不是什么“普世”的，而是资产阶级所专享的。无论是两党制、多党制，议会制、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保护与巩固资产阶级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在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权掌握在资产者手里，权力是按资本大小、财产多寡来分配与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金钱关系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钱袋子的民主，是富豪的游戏。他们所谓的民主，是资产者之间如何进行分赃的民主；他们所谓的自由是资本扩张与增殖的自由，是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自由；他们的所谓人权，是资产者压迫劳动者反抗的特权。他们在“西进运动”中烧杀抢掠，何曾想过印第安人的人权？他们把成吨的炸弹投向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叙利亚的时候，他们何曾考虑过当地老人、妇女、儿童的人权？他们攻击中国政府限制了“第五纵队”一些人的所谓自由的时候，何曾想过13亿中国人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自由？

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与超越。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劳动者的民主，99%的人的民主，而不是仅占人口1%的富豪们的民主。必须撕掉那些口口声声要维护所谓“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卫道士们的画皮，不能让他们再骗人了。

王广的书面发言表现出了大眼界。他以“唯物史观与五四运动”为题，阐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它是向着未来的，饱含恢宏的灵魂，洋溢着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在中华大地上未曾有过的革命首创精神。研究五四运动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大历史观，舍此则难以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不朽价值。所谓大历史观，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斗争

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宏大视野和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行程。要坚持这种大历史观，最为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事实上，由于历史观的差异，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就存在几种完全不同的评价。大体来说，体现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两翼。胡适等人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将五四运动理解为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蒋介石等人则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场灾难。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也对五四运动提出了种种质疑。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进而衍化为“告别革命”论；有人提出“倒退的‘五四’”说；还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又一大浩劫的开端”，遮蔽了新文化运动刚刚出现的曙光。凡此种种，花样很多。但究其实质，不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旧时藩篱，只不过其中又添了一些所谓文化史观、后现代史观的碎屑而已。

真正科学揭示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时，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和演讲，指出“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①这就对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做了高度概括。其后，毛泽东同志又在《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论著中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②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具有了新民主主义性质，从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概括，就不是局限于单纯的文化、思想领域，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命运出发而做出的光辉论断。没有唯物史观的历史穿透力和宏大视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只能抓住历史的一鳞半爪而自鸣得意。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大历史观，更深刻地揭示五四运动的丰厚内涵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为这片近代以来饱受蹂躏的东方大地带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是五四运动催生的首要的思想成果。五四运动上承新文化运动而来。新文化运动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决绝姿态，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形成了一场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同时，新文化运动有其自身的阶级和时代局限，在思想上一般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其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唤醒了一代青年”，“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9页。

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五四运动接过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并在思想的先进性上超越了后者，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经过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图谋、反对反动政府卖国政策的现实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较为系统的传播阶段。李达、李汉俊等人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人这样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正如斯言，伟大的五四运动所唤醒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卢雄鸡，即将啼亮近现代中国的沉沉夜空。

183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它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是富于感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伟大的新诗篇的序曲。”五四运动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样的时刻”，它一方面是“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退场；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拉开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序幕，并由此引发了广泛而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五四运动是一个光辉的起点，是一个光荣的开端，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蓓蕾。百年时光易逝，五四精神永存。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正是为了回望起始，不忘初心，面向未来书写更加伟大的新诗篇。

周群站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以“新时代为什么还要纪念五四运动”，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还要纪念五四运动的问题。

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讲话，从历史的、哲学的、时代的高度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还要纪念五四运动的问题，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一，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构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一环。五四运动的发生，是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斗争的继续和升华。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不同阶级领导、不同阶层参与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最终都失败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其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勇气，却鼓舞了后来人继续奋起，去狠狠打击帝国主义在华

势力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运动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其是一场到那时为止最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在于其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在于其是一场以文化运动为先导，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进而从根本上，它宣布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纪念。

第二，五四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五四运动所创造的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相号召，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追求、最热烈的企盼、最正确的方向。在五四运动中，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了追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才是伟大的五四精神。尤其是到了五四后期，五四精神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认识到，不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不会有前途，人民不会有希望。正是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赋予五四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从最早的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古田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路”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无不是五四精神的最新注脚，无不发展和丰富了伟大的五四精神。

第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继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发挥青年的作用。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①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此，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高举五四的旗帜，继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发挥青年的作用，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第15页。

储著武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以“70年的回望：五四30周年纪念述论”为题，介绍了70年前我们党领导的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活动的盛况，给人以诸多启发和感悟。

进入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有了根本性变化，创建新中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一年，正好迎来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革命青年与学生以及各民主力量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以团结和动员更多的学生和青年支援战争以及创建新中国。

1949年4月15日，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关于纪念“五四”三十周年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广泛开展五四纪念活动。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各解放城市展开。比如，5月3日晚，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到会工人、学生、教员达6000人。5月4日晚，北平市1000余青年代表在国民大戏院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会。此外，北平华北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80余所大中学校及青年团体等单位也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五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5月4日晚上，杭州21个大中学校4000多名学生就在浙江大学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五四”。如此等等。1949年5月5日，为了团结和组织科学界、学术界民主人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科学界、学术界和大学教授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与会学术界人士共有200余人。周恩来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配合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党领导的报纸集中刊发纪念文章。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介绍》《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纪念“五四”的公开信》《“五四”以来中国主要的革命青年团体介绍》以及14篇纪念文章。《进步日报》《群众》等报纸也对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作了报道，并发表相关文章。1949年7月，“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委员会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除全部收集《人民日报》上14篇纪念文章外，还包括其他23篇文章。这些文章较好地诠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概括起来，五四30周年纪念的重要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揭示五四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的系统认知逻辑。这成为后来革命者乃至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学习遵守的经典范式。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专门摘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反对党八股》中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并专门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同时，当时撰写的这些纪念文章中都着重谈到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

其次，强调民主与科学的重要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纪念“五四”就离不开对于“五四”最为核心的两大内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强调。当时部分纪念文章专门谈到对“民主”与“科学”这两

大口号的认识问题。如周建人指出“今日我们所了解的科学已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抽象概念，更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及为战争贩子效劳，这是不必多言的，而是为人民服务，并进而为人类的利益与幸福服务。所谓民主，也不是指少数人有政治权利与个人自由的‘民主’，却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是真正的民主。”^①而周恩来则明确指出“‘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尤其在民主与科学上。”

最后，指明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通过五四30周年纪念，让广大知识分子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为人民服务”，成为这次纪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周恩来表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是没有问题”。田家英指出“知识分子……决心为人民服务，才有自己的伟大前途，才能成为新中国的有用人材。”

70年前，中共领导的五四30周年纪念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发现五四的“当代性”，寻找到能够推动当下革命和建国的积极因素，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每逢五四运动十周年之际都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总体而言，不同时期人们对于“五四”的认知会有所不同。但在如何纪念五四这个问题上确实出现过一些不和谐声音，试图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希望将五四阐释往自己所强调的方向上引。可见如何纪念五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刘润为以“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问题”为题，对当年的“批孔”进行了理论上的辩护。

近10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够客观的。那么，当年的批孔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当然有些偏激、有些过头，例如传统文化学养十分深厚的鲁迅，激愤之下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诸如此类的观点和做法，是无须回避也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关于主观上的原因，毛泽东曾经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②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

^① 周建人《“科学与民主”》，《百年五四，前人怎么看？》，<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E-CB6VR20514AJ2B.html>。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1~832页。

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客观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儒学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势所趋，情绪偏激、说话过头，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利用它的某些偏颇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①

然而在今日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朝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前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使得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地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的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具体到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32页。

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的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杨毓康作为在校研究生，以“五四运动中‘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形成与影响”为题，阐述了青年运动的问题。

五四运动之前的“精英”与“大众”结构，其实和帝制时代是如出一辙的。在古代，政治史基本是政治精英的独角戏，儒教更是“君子俱乐部”。他们讲的从来便是牧民、养民、教民、使民、重民、爱民等，民众从来都是一个从属性的低位阶的群体概念。但在五四运动中，这一状况开始了亘古未有的扭转。

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发起，但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人民群众。上海发起的三罢运动，将运动的主力由北京转向了上海，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工人和广大市民行动起来了，才迫使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所谓的“精英”与“大众”关系，也自此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五四运动中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周恩来发起的“觉悟社”、武昌的“互助社”等。接受洗礼并成长起来的学生将逐步代替军阀官僚集团，也逐步取代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如蔡元培、胡适、林长民等），在未来最终成为新型的精英，这就包括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邓颖超、张闻天、陈潭秋等。

至于民众，从来在中国的政治史中就是“缺位”的，直到“五四”才被“发现”，其力量才被重视和开发起来，其地位也开始稳步提高。大部分知识精英从原有高高在上的牧养民众、教化民众或启蒙民众，开始转到贴近民众、赞美民众、依靠民众。整个社会也呈现了普遍的平民化倾向，出现了诸如平民学校、平民工厂、平民银行、平民医院、平民消费公社、平民剧社、平民俱乐部、平民游艺会、平民图书馆、平民食堂、平民洗衣局，以及冠以“平民”名称的各式学社、刊物，以“平民”为题开设的报刊栏目，乃至思想领域出现“科学平民化”“学术平民化”“军队平民化”“社会生活平民化”。这也就是说，新“精英”与“大众”关系在观念上逐步形成。

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更是将李大钊等人力倡的平民主义直接理解为对抗强权主义的思想，认为各种形式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充分表明了部分先进的五四知识青年的历史自觉，即最终走完了从平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步之遥！

The May 4th Spirit Shines Forever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EI Hong

Abstract: At the academic seminar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 the scholars attending the meeting talk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 s important speech. Commemorat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generation to give up their selfishness ,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st ideal and belief , and to persist in the road of combining with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turned corruption into magic , and profoundly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Xi Jinping ' 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commemorat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Understand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could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only Marxism can lead the Chinese nation to march forward. We must criticize the bourgeois democracy , and realize that the democr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m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 namely true democracy. We shoul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criticizing Confucianism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dialec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 and realize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riticizing Confucianism at that time. Only by proper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people ,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qualit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on the status of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Marxism;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imes value; Socialism